

纪念还是继承？

重读赫伯特·席勒

Commemorate or Inherit? Rereading Herbert Schiller

赫伯特·L.席勒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批判传播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被誉为“全球范围的媒介知识分子”，他不仅有力推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且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晓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纪念还是继承？

重读赫伯特·席勒

Commemorate or Inherit?
Rereading Herbert Schiller

刘晓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介绍和评析了赫伯特·I.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并结合全球化时代传播业的现状,分析了席勒思想的现实意义。席勒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批判传播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被誉为“全球范围的媒介知识分子”,他不仅有力推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

本书主要从媒介中立批判、跨国媒介批判、公司资本主义批判、信息社会批判和全球化批判五个方面评析了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并指出五大批判的关系;最后,分析席勒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及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当下的警示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还是继承?:重读赫伯特·席勒/刘晓红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424-2

I. 纪... II. 刘... III. 席勒(1917~2000)—政治经济学—思想评论
IV. ①K837.123.3 ②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780号

纪念还是继承?

——重读赫伯特·席勒

著 者:刘晓红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131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1424-2/K

定 价:32.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9.5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前 言

2013年6月6日,我有幸参加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1982—2012年)成立30周年的庆祝活动。开幕式的主题是“赫伯特·L.席勒及其传播遗产”。在这场以研讨会形式举办的开幕式上,不但播放了席勒在20世纪80年代解读《纽约时报》的珍贵视频,而且介绍了席勒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学者们对席勒为建立传播系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其学术遗产给予了高度评价,研讨会是在一种充满回忆的轻松氛围中进行并结束的。

但是令人觉得不无遗憾的是,整个研讨会除了回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似乎看不到对席勒学术思想的反思、批判和继承。我一直在想,难道这是美国人处理这类事件的特有方式和风格?毕竟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学术研讨会。在与该校学者私下的探讨中,我发现,对席勒及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似乎已经随着席勒的离开而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传播系渐行渐远,尽管传播系依然强调“批判”和“经验”传统的融合,强调跨学科的学术训练,但却很难发现对席勒及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继承。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正式创建于1982年,但是其源起于1970年席勒负责创建的传播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当时属于第三学院(Third College),即今天的马歇尔学院(Marshall College)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在席勒10余年的坚持和努力之下,传播系的创建终于在1982年修成正果,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取得了正式的院系地位。而席勒本人,自1970年受聘于该校后一直工作到1990年退休,而此后,席勒作为荣誉教授一直工作至1999年。可以说,席勒本人的学术生涯始终与该校传播系相伴随。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在今日学术界的声望与席勒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席

勒及其领导的传播项目要经历漫长的 10 余年才得以在大学取得的合法地位？席勒本人的回忆和一些学者的著作不但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而且再一次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社会时代背景对学术研究、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被描述为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学生反战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种族运动、女权运动此起彼伏。成立于 1961 年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自 1965 年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生了多起学生反战抗议运动，如抗议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抗议越南战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集聚了一批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作家、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等。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学生反战运动中，学生曾经把校长堵在办公室里，并占领了当时的第二学院，要求学校终止所有跟国防相关的研究，不再支持战争，并建设满足美国黑人、拉丁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高等教育需要的学院。由此诞生的就是席勒受聘的、设立于 1970 年的第三学院。正如席勒后来所回忆的，“新学院的建立是学生示威游行——事实上是占领大楼的结果……学生们的要求临时地、部分地得到满足本身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这反映出时代的动荡不安以及在越南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大学校园不稳定的状态。”^①

新成立的第三学院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与其他学院明显不同。在课程设置上，该院“选择了 4 个主要的领域：第三世界研究、科学与技术、城市与农村、传播研究。任何一个领域都注重满足少数族裔学生的特殊需求”^②。在管理上，由于在抗议活动中学生们提出自下而上的管理，即行政职员、学生、教师共同参

① Herbert I. Schiller.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36.

② Herbert I. Schiller.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36.

与民主审议过程的要求,尽管校方对新学院仍然有严格的行政限制,但是这个学院与其他学院相比还是一个大众参与的、民主的机构,学生们参与学院的日常事务,也正因为如此,席勒在受聘前需要通过被他本人评价为“极为少见”的学生们的面试,并负责主持传播项目,其正式身份是传播项目“协调人”。

虽然传播项目得到了校方的许诺,很快将获得院系地位,但这条道路事实上是非常漫长的。

从席勒本人后来的回忆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席勒的左翼政治立场及其具有批判、反思特征的授课内容引起了主流学术界的不满,在校内外被批评为意识形态。席勒指出:“我把我的任务解释为努力解释强大的传播系统在其各个领域(电影、电视、出版、报纸、录音和教育)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它如何创造不平等,或者至少可以说如何将不平等合理化的。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个视角不能像传统研究模式那样获得信任和行政支持。行政管理部门将我们这个微小的单位视为令人烦恼的传染病,希望马上消毒处理。”^①

此外,据理查德·麦克斯维尔(Richard Maxwell)分析,这个项目不能很快取得院系地位跟席勒没有能够处理好与行政管理层的关系而遭到报复有一定关系。当时第一学院——雷维尔学院的教务长向席勒强烈建议雇用他的一个老熟人,席勒认为该教授不符合要求而拒绝采纳这一建议,但不久这位教务长成了负责管理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并直接管理第三学院,结果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席勒没有得到晋升,没有享受加薪,也没有被邀请参加重要的委员会^②。我们认为,这个聘任插曲也许与席勒后来一段时期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待遇有一定关联,但绝非传播项目在当时不能取得院系地位的根本原因。

这个不被学校管理层看好的传播项目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得以存活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得益于席勒的授课风格和授课内容获得了

^① Herbert I. Schiller.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37.

^② Richard Maxwell. *Herbert Schiller*[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46.

学生的认可,其课程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主流学科课程。席勒的授课风格是生动的、吸引人的、充满活力的。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曾这样描述和评价了席勒,“英俊,又高又瘦,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演讲者。讲话时胳膊情不自禁地动来动去,演讲总是充满激情和冷幽默,他不用讲稿也能作出最好水平的讲座。他的这个天赋在公共广播电视系列节目《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中得以充分展示,在那里,他直面镜头对每日新闻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①席勒的课程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和引人思考的。理查德·麦克斯维尔回忆说,“他的课程说明了信息是如何被传递的,怎样解释信息的形式和意义,以及受众是怎样被组织来理解信息的”,“在教室里,席勒通过简单的说明就把媒介传播系统传播的社会信息和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席勒充满生气的教学方式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学生中很快就很出名了,许多出于好奇而选他课程的学生在听完了他的一次授课之后,就被吸引去研究传播。”^②“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政治学的学生而言,席勒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里平易近人的、令人受益的和令人鼓舞的教授之一。学生们亲切地叫他赫伯,称他‘酷’。那时候‘酷’的意思是进步派,激进分子,或者左翼……在激进主义学生看来,席勒是有着共同经历、共同斗争的同志和同路人。”^③

从席勒本人的回忆来看,传播项目最终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得以存活下来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兴起。由于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兴起,人们高度重视传播。席勒说:“我们这个项目得以生存的部分原因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的出现。”在当时,“美国的国家经济基础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服务部门的增长和工业部门的相对下降、跨国公司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传播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日益依

① Frank Webster, Herbert Schiller, Intellectual scourge of media manipulation and sceptic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N]. The Guardian, 2000-02-18.

② Richard Maxwell. Herbert Schiller[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47-48.

③ Richard Maxwell. Herbert Schiller[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xxi.

赖信息的经济的推进。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虽然这些发展尚处于形成阶段,但却不容忽视,传播新技术和信息经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重大意义,我们也不例外。”^①

此外,我们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传播项目得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生存并最终取得院系地位跟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发展也有一定关联。传播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逐渐获得美国大学的认可,并在 70 年代蓬勃发展。“美国大学拥有传播学院和传播系的数量飙升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从那时起就一直稳步增长。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传播系注册的本科生剧增,在许多大学的校园里,注册传播学的本科生人数最多,传播系或是人数最多的系之一。”^②传播学的这种发展得益于施拉姆及其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工作。埃弗里特·M. 罗杰斯(E. M. Rogers)曾经指出,在美国,传播学首先向大型的中西部大学的新闻学院扩散,如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然后再向斯坦福大学扩散。斯坦福大学是一个转折点,传播学得以在这所私立的、有名望的大学获得院系地位,极大地推动了它在其他大学的发展。此后,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培养了新一代的传播学者,他们到其他大学任教,并逐渐占据了教学和管理位置^③。当然,施拉姆所建立的传播学是主流范式的,其研究方法和立场与席勒有着很大的差别,正如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所指出的,“20 世纪 70 年代,传播研究在美国刚刚开始获得认可,主要是通过借用陈旧的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教条,并将其重新适当包装来争取学术地位。大学的管理者们只对如何从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这一旧的价值观转变到新的价值观——学术如何获取政府和大企业的资金感兴趣,席勒的作品很难获取

① Herbert I. Schiller.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39.

② E·M.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中译本. 殷晓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504.

③ E·M.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中译本. 殷晓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503.

认可。”^①尽管如此,传播学科逐渐在美国大学取得学术地位这一潮流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设立传播学系的进程。

席勒在主持传播项目的10余年间,聘请了许多知名的批判传播学者担任教职或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其中大部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如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卡阿利·诺顿思壮(Kaarle Nordenstreng)、奥斯卡·H.甘地(Oscar H. Gandy),此外,还有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文化研究学者迈克尔·里尔(Michael Real)等。这为今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的批判传播研究奠定了至今仍然受益的扎实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在席勒去世10多年后,在该校传播系建系30周年的庆典上,人们依然要重提席勒。

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在这位当代美国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病逝10余年后,重提席勒,其意义仅止于纪念吗?

当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不但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学术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与其相比,批判学派似乎日益边缘化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席勒时代是令人瞩目的,可在席勒之后的时代呢?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会随着席勒的离去而逐渐游离在学术边界,甚至消逝在当今的学术视野之内?席勒属于20世纪,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否也属于昨天?对于早已迈入21世纪的当下社会而言,它是否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有,那么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重读席勒,在批判地解读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同时,重新审视席勒的学术思想在当下的意义。

从西方传播研究的发展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取向的研究可以追溯得更早^②,它作为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研究方法的真正确立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1948—1949年,加拿大人达拉斯·斯迈思在

① Vincent Mosco, Herbert Schiller[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1, 2(1): 27-30.

② 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与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编辑的《媒介政治经济学》一书所收录的20世纪初的一些作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但鉴于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斯迈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这门课称作“传播经济学”(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s)。自此,揭开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此后,在北美和欧洲等地涌现了一批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如赫伯特·席勒、托马斯·古贝克(Thomas H. Guback)、阿曼德·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及尼古拉斯·加厄姆(Nicholas Gamham)。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了繁荣阶段,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指出,“随着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AMCR)政治经济学分会1978年在波兰华沙的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制度认可。”^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地域上划分,主要有北美和欧洲两个分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北美分支中,席勒作为斯迈思的承继者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灵魂和旗帜的作用。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举步维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席勒等人的坚持,就不可能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70年代后的繁荣。

赫伯特·席勒是为人们所公认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这位大器晚成的左翼学者一生论著颇丰,编辑和出版了10多本著作,其作品不但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而且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他的思想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他的作品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到20世纪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脉络。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不断涌现出一些年轻的学者沿着席勒所开辟的道路从事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受主流学派的影响,加之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席勒的思想在西方国家的传播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必要的重视。正如西斯·J. 哈姆林克(Cees J. Hamelink)所指出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虽然席勒享有盛誉,但是他属于传播研究这个团体中的少数派。虽然诸如‘批判’和‘独立’这样的观念属于一般的学术话语,但事实上,真正具有批判和独立特征的研究,其

^① Eileen R. Meehan, Janet Wasko. In defence of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J]. Javnost-The Public, 2013, 20(1): 39-54.

数量是极其有限的。目前,这些研究的前景比以前更加暗淡。全球范围的学术机构的商业化促进了那些可以获取资助的、能赚钱的研究项目。一般来说,这些项目也许可以带来声望,但是却无助于提高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的理解。”^①

从国内传播研究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界开始陆续译介西方传播学理论,受国外传播学研究取向——重实证研究的影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主流传播研究为重心的状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研究并没有引起同样的重视。有学者研究发现,以赫伯特·席勒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与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行政学派一起进入了中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批判学派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被称为“失踪者”或“夭折”^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学界再一次掀起了译介西方传播学著作的高潮,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传播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重新进入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出现了少量研究性的论文。

就我国的传播研究现状而言,研究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可以丰富我国传播研究的视野,推进我国的传播学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一方面,在面临着来自强大的跨国媒介公司的巨大竞争压力,面临着如何提高本国媒介的竞争力、保护民族文化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在媒介走向市场、面对市场过程中,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的问题时,目前已经出现了媒介片面追逐经济效益、损害受众利益等诸种现象;另一方面,媒介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地给我国的大众传播业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的大众传播业到底朝何处发展,成了业界、理论界不得不回答的迫切问题。席勒的批判传播政治经

① Cees J. Hamelink. Remembering Herbert Schiller[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1, 2(1): 11-16.

② 相关研究有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第31-30页)、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第11-14页)。

济学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警示作用,例如,他对跨国公司的批判有利于我们认清世界传播领域的形势,他对自由市场观念的批判提醒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市场的作用,不要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媒介的市场运作中必须给予必要的公共干预,提醒我们媒介改革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应该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公开地使用媒介,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因此,在当前研究席勒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当代西方国家传播业的不同发展时期为背景,通过考察赫伯特·席勒在不同时期的研究课题以及提出的主要观点,梳理席勒的代表性思想,并分析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性、关联性及其引发的争论等,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当下意义。

本书由7个章节组成。

1. 第一章——《战斗者的学术生涯》

本章首先从席勒成长经历及其成长的社会背景出发,揭示了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给席勒的学术思想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席勒青少年时期经历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等对席勒的左翼批判立场的影响。第二节一方面从总体上概括了席勒学术思想的特征,指出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将政治与经济权力纳入大众传播研究之中,将媒介置于美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权力互动这一更加广阔的视阈下进行探究,席勒左翼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其学术批判的目标直指西方媒介的私有权。另一方面,本节梳理了席勒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脉络:席勒早期将主要注意力置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与大众传播的互动,批判媒介中立;20世纪70年代以后,席勒逐渐将其视角投向国际传播领域,考察国际背景下权力关系的互动;80年代以后,席勒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信息文化领域,着力分析与信息社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90年代以后,席勒开始关注因特网以及相关的国内问题。

以此为框架,本书在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从5个主题来评析席勒的学术研究思想,并反思席勒学术思想的当下意义。

2. 第二章——《国家·公司·大众传播——媒介中立批判》

本章指出,媒介中立批判是席勒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其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在其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和《思想管理者》中,席勒以大量事实来论证美国大众媒介并非中立机构,而是被紧紧地束缚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

本章主要从3个层面阐述了席勒的媒介中立批判。第一,国家权力与大众传播的层面,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军方对大众传播及其资源的优先使用、国家作为大众传播业的管理者和信息提供者3个方面来阐述了席勒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批判;第二,公司与大众传播的层面,主要从公司力量争夺传播企业的控制权、公司力量利用广告为自身服务、公司力量推动传播业的变迁3个方面阐述了席勒对公司力量与传播业的关系的分析;第三,从大众媒介本身出发,阐述了席勒对大众媒介性质及其功能的批判——大众传媒是社会控制系统,充当着“思想管理者”的角色。

本章最后对席勒的媒介中立批判进行了评价,指出其观点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看待大众媒介的属性与功能的问题。大众传播业具有双重性质,它不仅是创造利润的商业组织,具有产业属性,作为一股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具有上层建筑属性,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西方主流传播研究基本上不考察或触及媒介的这种双重属性问题,或者一般只强调媒介作为商业组织的立场。这也恰恰反映了席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大意义。席勒的媒介中立批判贯穿于其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始终,以媒介中立批判为逻辑起点,席勒搭建起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框架,其中包括:跨国媒介批判、公司资本主义批判、全球化批判、信息社会批判等。

3. 第三章——《思想管理走向海外——跨国媒介批判》

本章主要以席勒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评价了这一时期

席勒的主要研究取向和主要观点。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传播领域,大量的媒介信息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向全世界流动。在世界信息与传播领域,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信息流动。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口号,反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信息、新闻和文化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席勒将其学术焦点投向了世界传播领域,结合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批判跨国媒介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形成了其跨国媒介批判思想。

本章从跨国媒介与民族国家发展、跨国媒介干预民族国家主权、跨国媒介与文化控制 3 个层面阐述了席勒的跨国媒介批判思想,将席勒的跨国媒介批判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跨国媒介是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发展的,它本质上是跨国公司体系的一部分;第二,跨国媒介为跨国资本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宣传消费主义;第三,跨国媒介是发达国家实施文化控制的工具,文化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一种支配行为,而且是经济领域的一种行为;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的跨国公司占据支配地位,这与美国的跨国公司实力、传播技术实力以及国家政策有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息自由流动原则。

最后,本章着力分析了席勒的跨国媒介批判中的核心概念——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引发的争论,并指出,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观点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汤林森等人对席勒的批判代表了西方主流研究的思路,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偏见;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涵、范围以及意义,文化帝国主义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化层面,揭示了跨国媒介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即跨国媒介给民族文化打上了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烙印,而是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层面,揭示了更深层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即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的扩张所引发的冲突与矛盾,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在世界的扩张手段之一。

4. 第四章——《公司接管公共表达——公司资本主义批判》

本章主要以席勒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一个时

期席勒的主要学术思想。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美国的公司权力逐渐上升,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挥支配作用,伴随着公司权力的上升,是国家权力的下降、个人权力的受损,为此,席勒将其研究焦点由国际传播领域转移到美国国内,将其批判的利剑直指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私人公司,形成了其公司资本主义批判思想。

本章主要从 3 个方面阐述了席勒的公司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第一,公司权力的变迁,包括公司权力上升的法律基础——公司言论权获得宪法保护、公司权力变迁的体制基础——解除管制、私有化和商业化;第二,谁拥有媒介权力,包括公司接管整个文化工业、公司实施信息剥夺——公司言论取代个人言论成为信息主体、富有者对穷人的信息剥夺、公司对社会信息的剥夺;第三,在公司接管文化产业、公共利益原则遭到废弃、市场关系蔓延的环境下,如何保护民主建设所必需的公众言论和公共利益。

本章最后指出,席勒的公司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就是对大众传播私有权的批判,强调公共利益原则。这一立场受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人达拉斯·斯迈思关于媒介私有权批判的影响,并与欧洲学者默多克、戈尔丁、加纳姆等对媒介私有权侵害公共利益批判相得益彰。所不同的是,席勒的批判以美国的媒介现实的批判为构架,侧重历史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尖锐而有力;而默多克、戈尔丁、加纳姆则更多地关注英国的媒介现实,其私有权批判以公民权理论或公共领域的思想为框架,侧重理论分析和现实批判的结合,系统而透彻。与其他学者相比,席勒对媒介私有权的批判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不刻意去寻找理论支点,而是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上阐释其观点,这也是其作品最突出的个人风格。

5. 第五章——《谁是信息技术的获益者——信息社会批判》

本章阐述了席勒关于传播技术、信息社会的基本观点。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以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为基础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社会”理论盛行,人们开始对信息社会以及传播新技术抱以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针对这种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信息社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新技术成为席勒的学术研究焦点之一。

由于席勒研究传播新技术的基本立场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已经确立,本章首先对席勒关于传播技术的观点作了历史性追溯,指出,在席勒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就已经确立了传播技术分析的起点——技术的所有权问题:技术归谁所有,为谁使用?接下来,本章从“谁是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受益者”和“谁的信息社会”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席勒的信息社会批判思想。

在《谁是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受益者》一节中,从以下两方面评述了席勒的基本观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军方与私人公司是传播新技术的主要控制者和使用者,两者互惠互利;在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成为主要的使用者和获益者。在《幻灭:谁的信息社会》一节中,阐述了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批判,包括:信息社会理论所强调的传播新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自主的选择、使用信息的机会,促进了平等、民主参与以及多元社会的形成等观点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一种幻想;信息社会是公司控制的社会,仍旧是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蕴含7个悖论——资本主义恢复活力悖论、消费主义悖论、国家主权悖论、信息富裕的悖论、工会组织消失的悖论、经济利益与文化后果悖论、思想脱离现实悖论。

本章最后分析指出,席勒对于传播技术以及信息社会的观点体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贯的研究立场——历史性、整体性原则,并受到了达拉斯·斯迈思的技术观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思想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席勒一方面承认了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丰富性、即时性、互动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技术的局限性及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强调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对技术的使用。

6. 第六章——《全球商业信息新秩序——全球化批判》

本章主要以席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席勒对全球化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随着英、美等国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世界经济从跨国化过程开始向全球化转变。在世界传播领域,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掀起了解除管制,推进媒介私有化、商业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浪潮,正如席勒本人指出的,全球电子环境设置了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的核

心主题,任务就是揭示这一环境的内部冲突和欺骗性。

本章从“全球化”及其动力、美国推动全球化的动机、传播领域的全球化及其后果3个层面阐述了席勒的全球化批判思想。主要包括:“全球化”术语的分析;全球化的三大动力——私人公司、美国政府、传播新技术;美国政府积极推进传播领域的全球化动机——基于21世纪的帝国梦想,基于对信息控制重要性的认识;传播领域的全球化相当于全球商业信息新秩序;传播全球化将会严重削弱国家主权,造成文化支配,并加剧国际社会的的不平等。

本章最后分析指出,席勒的全球化批判实际上与其跨国媒介批判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跨国媒介批判的进一步延伸,只不过其研究问题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跨国媒介批判的背景有很大区别,虽然研究的是同一对象,但揭示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跨国媒介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以跨国媒介为对象的全球化批判则具有了阶级权力分析的特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权力分析是从阶级的分类观的概念出发,即根据不同群体对传播资源的生产及分配的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同,揭示不同群体对传播业的影响及其在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席勒的全球化批判实际上就是把这种框架移至国际社会的视域下进行分析,席勒的基本逻辑是: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资源优势,从而拥有了在该领域的支配权,传播领域的全球化最终的受益者是这些发达国家,贫穷国家因为没有传播资源优势,从而处于被支配地位,而这种被支配地位又反过来制约其资源使用,因此传播领域的全球化将会加剧国际社会的的不平等。

7. 第七章——《席勒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本章对席勒的批判思想做了哲学观和方法论的探究,并对席勒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作了概要评价。

在哲学观的分析方面,本章指出,席勒的作品隐含了从事实批判到批判的哲学思考这样一种路径。席勒的事实批判是以一些术语为核心展开的对美国媒介实践、媒介政策和体制的批判,这些术语包括:军商或军工复合体、政商复